

《邓小平文选》

学习辅导

禁金 增刊

办公室 318

《邓小平文选》

(1938—1965年)

学习辅导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攀登》编辑部

一九八九·十

责任编辑：郑 诚

编 辑：罗会仁 傅承信 赵德兴

攀登 增刊

一九八九年十月

主办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编辑出版：《攀登》编辑部 ISSN1001—5647
国内统一刊号：CN63—1015 发行：《攀登》发行组
增刊号：青新出(89)准字第60号 印刷：青海省海南印刷厂

地址：西宁市黄河路一号 邮政编码810001 定价2.50元

390939

目 录

代序.....	(1)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重要文章介绍.....	(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	潘荣廷 (16)
简论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整顿党 风的思想.....	闰润鱼 (31)
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 ——读《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冷 溶	(45)
伟大的战略进攻之举 ——谈《邓小平文选》中军事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宋毅军	(49)
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读《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陈 理	(55)
党的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 ——读《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及有关篇目	马欧治 郑 诚 (65)
财政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读邓小平有关财政工作的两篇讲话.....	杨瑞广 (82)
邓小平任党的总书记期间的几个重要思想	谢春涛 (93)
邓小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经济思想	王家杰 (104)
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指南 ——读《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杨瑞广 (120)

走自己的路，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论述… 筱 文 (125)

关于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几个问题

——学习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 苗长发 (135)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

——学习邓小平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论述… 姜爱东 (152)

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多做工作

——读《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龙平平 (159)

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 于伟国 (168)

勘正在“猫论”问题上的讹传与误解…… 龙平平 (176)

学习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文献

——读《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 于伟国 (186)

邓小平经济思想概述…………… 冷 溶 (210)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根本前提…………… 筱 文 (220)

深刻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学习《邓小平文选》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王丛标 (238)

试论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 杨瑞广 (249)

· 资 料 · …………… (269)

编 后 记 …………… (288)

代 序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文选，集中了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二十八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三十九篇，近二十五万字。其中三十篇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文选所有文稿在出版前经作者本人审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十七年这几个历史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后期还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这一时期编入文选的著作九篇，对抗日民主政权中党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策略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1941年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批评了当时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倾向，这对于认识今天的党政分开原则，仍有重要意义。在1943年发表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提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

智；要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大牙交错的复杂斗争情况，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敌进我进”以及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作准备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夺取华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总前委书记。他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多次在具有关键意义的广阔战场上，与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同志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文选中收入这一时期的著作七篇，论述了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直至京沪杭作战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制定了中原新解放区土改和整党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政策和策略被党中央认为普遍适用于一切新解放区，对建国初期政策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所作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两文，突出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斗争中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和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以及在新的复杂情况下善于发现新问题、勇于提出新观点、能够打开新局面的革命胆略。后一篇文章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建国后十七年中，前三年邓小平同志担任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职务，独立负责一个大区的全面领导工作。文选收入这段时间的著作六篇，涉及新区工作的策略、新闻工作、统战工作、土改、镇反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1950年作的，至今对全党的新闻工作仍有指导意义。同年作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是一篇对

民族工作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充分反映作者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色。

邓小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先是担任政府副总理和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以后，当了十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参与党和国家全面领导工作。文选收入这段时间的著作十七篇，其中论述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任务的观点，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以及为克服三年经济困难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在这一个时期。他特别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从党的指导思想、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一方面的主要著作。1957年作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文章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因此，党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同时，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1960年的《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文尖锐地批评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反对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摆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外、之上。这篇讲话表明了邓小平同志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一贯坚持原则的态度。

从这本文选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文选中一些基本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认真学习这本文选，必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三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的发展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则立场和创造精神，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有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

重要文章介绍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收入了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17年这三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著作39篇。现将重要文章介绍如下：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是这本文选的开卷篇。这是1938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时所写的文章。当时，抗日战争开始还不久。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文中着重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要从政治上保证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开赴前线，使昨天还是一个有浓厚家庭观念的老百姓，很快成为军队中的熟练战士。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发表于1941年4月。当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即将成立。文章着重论述了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指出当时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是敌后抗战最好的政权形式。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

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文内尖锐地批评有些党员错误地以为党的优势就是党员包办，党的领导就是“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传统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党对政权应该是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战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是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两个部分。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报告综述了五年来同敌人在华北进行的尖锐、严重的斗争，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的斗争。总结出十条非常重要的对敌斗争经验，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要关心人民的问题，保护人民利益，争取敌占区人民的支持；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建设根据地；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坚持敌后斗争去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报告强调指出：“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发表于1943年7月。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目的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文章确定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

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生产的重心的方针。强调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并且规定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文章指出，我们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正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3年11月。当时太行区正开展整风运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文章回顾党的历史经验时说：遵义会议之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是解放战争处在转折时期的1948年4月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文中指出，中原野战军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使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文章说：中原战场“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又说：革命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屈服于困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定的人。

“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

地打过长江。”这篇文章突出反映了作者在革命斗争中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和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是1948年6月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他根据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中原地区的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新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具体政策。这个指示报送中央，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增写了两段文字。毛泽东同志转发这个文件时，在写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说：

“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是1948年8月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综合报告的一部分。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不论在作战、供应、社会政策以及干部准备等方面都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无论在内战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经验，邓小平同志根据一年来新区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进入新区后的一些重要意见。报告提出，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在军事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将斗争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团结大多数，以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是1949年8月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胜利地结束淮海战役之后，又进行了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报告生动地介绍了渡江作战的情况。指出渡江作战的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是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时期，在1949年11月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即将进入贵州新区的五兵团负责同志的电报。电报指出，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即蒋介石在贵州安插和培植的势力）的口号，这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事实上中央系中绝大部分人都在动摇。电报要求：“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对于进入城市后遇到的困难复杂的问题，如货币、物价、工资问题，乡村的借粮问题、治安问题等，提出要尽快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来解决。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于1950年5月。报告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提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这篇文章论述的许多思想，在今天对于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仍有现实意义。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是1950年6月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实际上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整风动员报告。文中指出，西南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还有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以及正

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他说：“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又说：“这些倾向还表现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特别是在领导同志中间。”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些不良倾向。能不能克服呢？文中指出，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经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是1950年7月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文章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最多、问题特别复杂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关于做好民族工作的具有原则性的意见。文章指出，现在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民族工作一定不能患急性病。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工作，都要掌握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一定要得到他们大多数人的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的赞成。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是需要的，不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是1954年1月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所作报告、总结的一部分。当时邓小平同志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报告针对国家财政不稳固的情况，提出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目的是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

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调动大家节减开支、克服浪费的积极性。在会议的总结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指出在这些关系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前者是主导，如果发生矛盾，后者应服从前者。一句话：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是1954年2月6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这次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邓小平同志的发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巨大胜利，在我们党内尤其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如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经受了考验，但经验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为此，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和来自群众与党外人士这两个方面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报告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问题，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等。这个报告是论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1956年11月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

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说，党的七大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这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是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报告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比搞革命要困难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本领差得很。他特别强调，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文中批评了有些企业贪新贪大，搞形式主义，给国家造成严重浪费。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面对国家的现实，二是面对群众的需要。这些思想对今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也是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文中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